

—

# 走进侍从室



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在中四路靠近曾家岩的地方，有一条水泥铺地的小巷，高高的围墙里，隐约露出了里面洋楼的一角。除了早、晚之外，很少有人在这里进出，似是一处达官贵人私家住宅。熟悉重庆政界情况的人走过巷口，都会有一种神秘而又森严的感觉；即使不熟悉这里内幕的人，见了这条巷子也会感觉到一股高深莫测、不同寻常的气氛。

1941年初冬的某一天，笔者走进了这条名叫德安里的小巷，在这森严的环境里，开始了难以忘怀的四年侍从室生活。

## 一、蒋氏内廷——德安里

1938年，在国民政府西迁时，当时的西南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几乎征用了重庆大大小小看得上眼的所有楼堂馆所。上清寺、国府路和曾家岩一带，原本是一些四川军阀修建的高级住宅区，后来就被征用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办公地，而其中心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所在地——德安里。这条小巷颇像上海的里弄格式，长约百余公尺。巷子的右边是行政院驻地，左边不远处是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面对着那时有名的教会学校——求精中学。小巷里的机关虽重要，但巷口却不置大门，也不挂官厅的牌子，偶尔一瞥，甚至连门卫也见不到。殊不知这里除侍从室外，委员长蒋介石

石的官邸也在其中，至于蒋究竟在哪座洋楼里办公，则更鲜有人知了。

熟悉内情的人们知道，小巷一边的围墙里，稀稀落落地座落着五、六幢两层洋楼，每幢洋楼之间都有庭院隔开。对面的围墙内则是一片空地。空地的一边修有一排简易平房，当初大概是供洋楼主人的警卫人员及下人住的，而现在仍作为侍从室警卫人员的营房和操场，还设置了汽车库。为便于管理，侍从室总务组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至于那些贴身卫士、便衣和侍卫官则住在洋楼的院子里。

蒋介石的官邸深深地隐藏在德安里的弄底。这原来是张群在重庆的住宅。蒋来渝后，楼房内外修葺一新，用作蒋氏夫妇居住之所。不远处就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孔祥熙、吴国桢等亲信所居住的“范庄”（注）了，其间有小道相通。这些要人有事向蒋请示，不必绕大门就能过来。1944年间宋美龄去美国耽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在宴请外宾时，就请吴国桢夫人黄卓群代作宴会时的主妇，她也常从自己家里走小道径直来到官邸宴会厅。那个有名的孔二小姐——孔令伟也常从“范庄”后花园来到蒋的官邸走走。当然，除了这两家得地理之便及同蒋氏夫妇关系非同一般外，其他大员要晋见蒋介石，则仍须事先通报，得允许后再坐车从德安里进来。

蒋氏夫妇官邸外边的一处地方叫“尧庐”，原是川军将领许绍宗的家产。这里有两幢楼房，一幢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办公室兼住宅，另一幢楼下是第一处的第二组，楼上则是第二处的第六组。后来毛庆祥的机要组成立，又在院内北侧盖了一排平房，用作办公室和职员宿舍。紧贴“尧庐”的另有一个较大院落也有几栋房屋，主要的一栋中西合璧的古典式建筑，即是第四组

的办公处；进门有一排平房，则是侍卫官宿舍和警卫组及侍卫长办公室。此外，医务室和理发室等也设在这个院内侧面的平房里。以上这几个组是处理蒋介石各类重要公务的幕僚机构，所以就安排在蒋身边的德安里。第二处主任陈布雷那时住在上清寺美专校街溶庐，平时在家中办公。第二处第五组则附设在陈宅毗邻的一幢平房中。后来成立的侍从室第三处，则设在重庆南岸小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陈果夫的住宅旁，离德安里很远了。

德安里侍从室的门岗不在巷口，而设在离路口十几米远的隐蔽处。在围墙两侧，面对面站着两个身穿军服、全副武装的卫兵。岗哨前面，有一小土岗。上坡几步路，还有一间用作收发室和会客室的小屋，边上才是侍从室大门。外面的人因公要进去，需先在收发室填写会客单，而后由值班员用电话同里面联系并得许可后，方能由当事人亲自到门房接来人进内。办事毕，再亲自送出来。而一般职员因私会客，则只能在会客室里谈话，绝不能随意进去。

那时一般的政府机关人员都佩有标明所在院、部的证章，一眼望去便可知道他们服务的单位。而侍从室职员佩戴的证章则不标明单位，仅在上面有一个特殊标记，且经常更换。有时是一圆形的青天白日图案，有时是三角形的鹰徽等等。上校以上的官员与一般职员的证章又有区别，因为他们的职别属保密范围，所以只有特工、宪兵和警察中的部分人，才能识别出他们的身份。虽然如此，由于侍从室一般工作人员平时都穿着发给的毛料制服，所以附近的机关人员及老百姓依然明白这些人的工作性质。

德安里也有热闹的时候。每当蒋介石要外出时，先由侍卫

长或警卫组长按电铃通知值班侍卫官和卫士等警卫人员。按规定，听到第一次铃响声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第二次铃响，相互检查服装仪容和枪弹配备，然后跑步集合在门口等候；第三次铃声急促响起，蒋介石的黑色凯迪拉克大轿车已缓缓地从官邸内驶出。前座上侍卫长神情严肃地端坐在驾驶员旁边，蒋则坐在后座。后面紧跟着两辆警卫车，车门敞开。一到门口，八个侍卫官和便衣卫士便一拥跳到车上，各就各位，手中握着手枪，两眼直视前方。接着油门一轰，车子开出德安里疾驰而去。沿途的保卫工作，自有各地段的宪兵、警察和军统的便衣早就作了布置。

德安里内内外外的森严氛围是由侍从室严格的纪律约束形成的。侍从室人员虽不多，但规章制度甚严，如内部人员不能随便同外界接触，不能随意发表言论和文章，上下班不可迟到早退，更不能随便请假。又如那枚佩戴的证章，如果遗失，要立即报告警卫组，当事者必须作检讨，甚至给其记过处分，还要通报全体工作人员更换新的证章，废止使用旧章等等。在这样的约束下，侍从室职员大都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工作着，所以平日里德安里这条小巷总是静悄悄的，不像重庆其他机关那样松松垮垮 人员杂沓。

（注）范庄 系原四川军阀范绍曾的公馆

## 二、我怎样进入侍从室

说起我进侍从室工作，其间也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我青年时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次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对日“自卫”的宣言。至此，全面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我闻讯立即从日本回国，当时才23岁。到了上海，我亲眼目睹中国军民同日寇英勇作战的壮烈场面，不由得热血沸腾，想到自己身为中国青年，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理应投笔从戎，杀敌报国。恰在这时，我看到了9月22日刊登在《申报》第一版上的一则公告，内容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号召留日归来的学生，踊跃到南京去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个抗日军政训练班。我喜出望外，立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不数日便进入训练班开始入伍训练。以后随着战事的发展，我随该班辗转行军到庐山、江陵，直至1938年5月方在武汉结业。

这个训练班名称更改了几次。一般称为“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主要任务是为政府训练培养抗战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主持人起初是陈立夫，继之为康泽，最后由新成立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负责。我在结业时，因日语考试在班上名列前茅，被分配到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

当时的政治部是国民政府中公开容纳共产党人和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参加的一个机构。除部长由陈诚担任外，副部长是周恩来和黄琪翔。我所在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第七处处长是范寿康；敌情研究科科长是杜国庠。我先在敌情研究科工作，后来又调到对敌宣传科，科长冯乃超。也就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日本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1941年1月，伏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的短暂蜜月发生危机，关系虽尚未完全破裂，但摩擦日见增多。这时，陈诚因宜昌失守，引咎辞去中央职务，去鄂西恩施专任第六

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政治部部长一职由张治中接任。张到任后 将第三厅以郭沫若为首的红色“文化人”统统圈在一个名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构里，以缩小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但我既算不上“文化人”又不是共产党员 日后如何工作，当时真有点进退维谷。

在这之前，第三厅因为我日语较好，曾要我兼作“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会长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翻译。陈诚调任后，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他的侍从秘书、也是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同学刘真转告，谓鹿地亘组织的一个名叫“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前线工作队”要求去前线开展对敌宣传工作。这个要求已获陈诚同意，要我以新任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陪同鹿地亘一行前往。得到这个消息，我心想，这正是摆脱目前窘境的好机会，于是赶紧打点行装，随鹿地亘的工作队去了宜昌前线，在三斗坪，石牌、南津关一带前沿阵地作了三个月的对日反战宣传工作。其间，鹿地亘每天撰写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寄自火线上的信》都由我译成中文 用军邮发送给在重庆的冯乃超，在《大公报》和《新蜀报》上作连续报道。因其内容新奇生动 故读者甚众。作为文章的笔译者，我的名字同鹿地亘并列。后来据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邵毓麟告诉我，当时他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译笔甚是流畅，由此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他又对我说，那时他还选了我所译的其中一篇交给陈布雷看过，陈对我也留有印象。这也许是我不久能进侍从室的一个契机和伏笔吧！

以后，《寄自火线上的信》这篇译稿 又由金长佑主持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在重庆结集出版，并在大后方的许多地方发行。

再说我完成了陪同鹿地亘一行到前线对日军的宣传任务，回到重庆已是这一年的 5 月份。重庆各界假座大梁子亦园大戏

院，举行欢迎日本反战人士胜利归来的大会。当我在会上为鹿地亘的演讲口译结束，回到主席台就座时，发现邵毓麟就坐在我的身边。

交谈中，邵说他今天是以“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代表的身份出席欢迎会的。随后他同我拉起了其他问题，说：“看了你的笔译文章，今天又听了你的口译，我对你十分欣赏。现在外交部情报司新设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战时日韩问题。希望你能来和我共事 协助我搞好这项工作。”我当即表示 愿意接受这项我感兴趣的工作。但又告诉他，现在我必须先回恩施，向辞公（陈诚字辞修）汇报自己完成的任务，而后请求辞去我在战区的秘书职务，这样方能来外交部供职。邵毓麟表示理解，说随时听候我的消息。

谁知我回到恩施后 方知陈诚的亲信、时任《新湖北日报》社长的谢然之（也是留日学生）已得到陈诚的同意 邀我去他的报社工作。我虽不大情愿，但也不便立即推却，这样就又在报社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来我通过好友刘真向陈诚陈情，说我有志于外交工作，希望同意我离职去重庆。不久得到回音：陈诚理解我这个年轻人的心情，同意我离职去渝。我十分高兴。临行，陈诚还送我一百元旅费，并介绍我搭乘去重庆开会的建设厅长朱一成、教育厅长张伯谨的专车。辞公作为长者的这番厚意，我至今仍铭记不忘。

前面谈到，陈诚曾担任过“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后来他对这个班的学员都很器重。学员结业时，他留下了刘真、张宝树等几个班中佼佼者当自己的秘书，并要他们经常联络训练班的数百名学员，以便他了解学员的工作情况。1949年，刘、张等人也随同去了台湾。刘真以后担任过台湾师范大学

校长、立法委员等职。张宝树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可以说，这几位老同学是一直很得陈诚信任的人。这是后话了。

就这样，我到了重庆，在邵毓麟的安排下，开始去外交部情报司工作。

### 三、邵毓麟的推荐

说起来，邵毓麟同我既是宁波同乡世交，又是我留日同学中的先辈。他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曾以学业优秀、才智超群，被誉为“九大三鹰”之一（“九大”即九州帝国大学，“三鹰”指高宗武、董道宁、邵毓麟三名留日学生）。回国后，他到外交部供职。1937年中日上海战争爆发后，第二年他即从驻日本横滨总领事任所卸职回国，在武汉又得到陈布雷的推荐，进侍从室担任秘书，与王芃生等一起研究日本问题，成绩斐然，深得蒋介石的重视。

1941年，原外交部长郭泰琪被蒋介石免职，一度由蒋自兼外交部长，实际上该部政务却赖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处理。陈为了掌握外交部的实际情况，签呈蒋介石，在侍从室的秘书中，抽调李惟果去外交部任总务司长，掌管人事、礼宾、财务等枢要部门；邵毓麟出任外交部情报司长，以作耳目。一时在以职业外交家为主的外交部中，李、邵两人被视为从侍从室来的“钦差大臣”，真可谓炙手可热。这种状况一直到吴国桢调任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并代理部务后方才改变，（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在美国）

在侍从室的秘书中，各种人才都有。他们大都是蒋介石为

储备一些行政骨干人员而吸收进来的。这些人在侍从室勤勤恳恳地研究各类问题，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出谋献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得到蒋介石或陈布雷的信任，一旦外放，都能获得行政要职，官至简任以上。再加他们的政治背景硬，以后往往仕途顺利，升迁很快。例如那时的徐道邻、毛庆祥、萧赞育、李惟果、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诸人，后来都显赫一时。于是人们常把进侍从室看作是“跳龙门”的一个阶梯。

邵毓麟当然也已踏上了这个阶梯。这次他兼任外交部情报司长后，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外派去担任大使一类的职务（以前他仅任总领事职）。但他所在的侍从室第六组，是蒋介石综核一切特工组织搞情报工作的一个组，组长为唐纵，乃军统三大金刚之一，其他两人为戴笠和郑介民。所以在对日作战时期，蒋介石和陈布雷是不会轻易地让他这个“日本通”从第六组的重要位置上撤下来的。更何况邵又是陈布雷所信任的人，将他放在军统人物当组长的第六组，也自有陈的用心。唐纵对陈布雷是极尊重的，他知道邵毓麟是陈的亲信，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然对邵也很看重。

邵毓麟既有外派的愿望，亦知道自己在侍从室的工作不易卸去，因而就想物色一个人，到侍从室来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以求最后接替他的位置，这也许是他不久要我进侍从室与他共事的最终用心。于是，他在外交部的岗位上进一步熟悉了我的工作能力和其他情况后，就向陈布雷提出，自己因为在外交部兼职，工作忙不过来，希望能在第六组给他增设一个助手。接着，他把我向陈作了推荐。布雷先生问清了我的学历、经历、人品、能力以及籍贯、家世等情况后，答应考虑，并要在适当时候找组长唐纵一谈。

邵毓麟也知道进侍从室难，特别是进第六组这个处理情报的要害部门更难，但他也考虑到推荐我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学历有利。我同邵毓麟一样，也是日本帝大出身，能够适应邵要我担负的工作。第二，能力有利。我回国后从事的工作，一直同日本问题的研究有关且日语水平，无论是笔译、口译，皆受到同行的好评，陈本人也有所了解。第三，家世有利。我和陈布雷都是宁波人，我父亲在民国初年就结识陈的堂兄、宁波耆宿陈杞怀先生，有过文字交往。我的伯父张葆灵曾在陈布雷青年求学时代，对他作过关键性的帮助。

但唯一有点成问题的是，我曾在第三厅工作过，又同日本左派人士鹿地亘有过一段交往，因而似有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之嫌。因此在邵毓麟陪我去见陈布雷时，他就委婉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立即主动说明：我受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培养，是陈辞公的学生。我去三厅工作是辞公所分配，当鹿地亘的翻译并去前线亦是奉他的命令，且当时我还有陈辞公的机要室秘书的身份。这段历史，辞公可作证明。总之，我反复抬出了陈诚这块“金字招牌”，陈布雷也就不再问什么了。最后，他对邵毓麟说：“此事还要同乃建、唐纵之字、组长商量。”

又隔了一星期，邵毓麟叫我同他一起坐车到德安里见唐纵。见面后，唐很客气，和我随便聊了一会儿，就对邵说：“令澳同志的事，我们已签呈委员长批准了，只待委座亲自召见。我欢迎他来六组协助你工作。”从此我终于进入了德安里大院，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幕僚了。

## 四、侍从室的组织机构

1937年8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11月日本政府即正式设立大本营，作为战时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中国政府在抗战8年中，始终未专设过类似的大本营，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替代，其最高统帅即为特级上将、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

然而，按笔者之见，军委会其实还算不得是真正的大本营，真正的大本营倒是蒋介石在那时的全能幕僚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说它全能，是因为蒋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会委员长三职于一身，那么，战时一切重要事项的决策、审定，自然都要经侍从室这一关，进行筛选或提供意见。也正因为这样，侍从室成了超越军委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

从历史上讲，侍从室早在1932年南昌行营时代就设立了。那时候，蒋介石为对付共产党武装和其他地方势力，时而南京、时而南昌、时而川黔到处奔走，十分忙碌。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有一批能随他奔忙的参谋、秘书和译电人员，及时为他处理各类函件公文。这样，侍从室便应运而生了。

到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已趋巩固，权力更加膨胀。于是在改组后的军委会颁布的“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设立“由委员长直辖的侍从室”并指出其任务是：“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以资佐助。”所以直到这时，侍从室的组织机构才有了根据，内部人事也日臻完备。

侍从室设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和侍卫长四个系统。

第一处以处理军事方面的业务为主，下分三个组。第一组也可称作总务组，它负责办理侍从室包括官邸的机关事务、交通工具使用、后勤供应、接待宾客等工作。这个组织传统上一直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历任的几位第一处主任都不具体过问其内部事务。第二组系军事参谋组，汇集了不少对军事问题有研究、有造诣的军事参谋人才。军委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的报告、请示、函电等文件都归该组办理。第三组是警卫组，它虽隶属于第一处，而实际上是侍卫长直接指挥的一个组。该组情况后再详述。

第二处以处理党务、政务、外交、情报等业务为主，也分三个组，排名为四、五、六组。第四组是该处最重要的一个组，举凡中央党部、行政院的各项呈件以及蒋的手谕都归四组办理。第五组则专掌蒋的言行记录和汇编整理蒋历年的讲话、文告等，它的意义在于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第六组专事情报业务。国民党各情报机构获取的情报资料均由该处进行综核、研究、处理。此外，它还兼管这些机构的组织、人事。该组名义上属第二处，实际上由一、二两个处共同领导。因为按惯例，第一处主任必然兼任军统局局长（副局长为戴笠），而军统又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所以一处显然要同第六组的工作发生关系。

除上述六个组以外，侍从室还有一个机要组，是专门处理蒋介石的往来电报和蒋直接指挥作战的重要通讯机构。组内配备的秘书和译电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挑选。蒋去各地，也由该组派出的译电人员随行。它的其它任务还有：编制和配发军委会所属各部门通用或专用的密码电本；监听和控制各地公私电台；收发和翻译国内和盟国的密码专电；破译和研究敌方电台发出的

密码电文，等等。这个机要组是后来成立的，原来还有一个军委会的机要室，但实际上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由于该组由蒋直接掌握，因而侍从室的主任对其有指导之责而无指挥之权。

侍卫长所掌管的警卫部门又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原先在王世和、宣铁吾担任侍卫长时期，是隶属于第一处主任的。但自1941年秋，蒋介石任命俞济时为侍卫长以后，就把侍卫长的地位提升为与第一、第二、第三三处主任并列，直接负责对蒋氏夫妇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前面谈到的第一处第三组（警卫组），实际上也归侍卫长领导和指挥了。

第三组下分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三个部分。

警卫股的人员又分侍卫官和卫士两类。侍卫官是军衔从中尉到中校的军官，而卫士则属军士级别。他们执勤时一律着毛料中山装，以颜色、衣质作为身份之别，平时都佩带武器。在蒋氏驻留的官邸和外出视察的场所，均由侍卫官和卫士不分昼夜地轮流警卫，甚至在蒋氏就寝的卧室门前也由最亲近的侍卫官彻夜把守着防止出现差错。

侍卫官因为是最贴近蒋介石的人员，所以为蒋的安全计，所选择的几乎全是经多次考核审查后才入选的蒋之乡亲故旧及他们的子弟，一般不是蒋氏宗族内的人就是竺姓、毛姓、王姓的姻亲后辈。他们人数不多（约八至十人）根基清楚是可以信任的人，而外人则绝对不用。例如在西安事变中死亡的蒋孝镇，就是蒋介石的侄孙。由于这层血缘关系，因而大凡侍卫官都养成了一种习气，即心目中只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对他们绝对服从、卑顺，而对其他人则显得骄矜自持，从不对人轻易谈笑。

警卫股在侍卫系统中最为重要。它除担任上述内线警卫工作外，还有安排侍从室的内外勤杂人员、调动外围警卫部队（包

括驻军、宪兵、警察等)监督和检查警卫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在某些场合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等权力,所以说它是按侍卫长的意图保障蒋氏夫妇安全的具体执行部门和武装力量。

特务股是以另一形式保卫蒋氏夫妇的部门。它的任务是按警卫计划同当地的卫戍部队、宪兵、警察以及特务机关(主要是军统局所属各地区站和稽查处之类的单位)密切配合,采取侦察防卫等行动。其特务人员多为戴笠所派,但必须绝对服从侍卫长的命令。

警卫大队可说是保卫蒋介石“内廷”的另一支亲兵。它由三个步兵连、一个摩托化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组成,由侍卫长直接掌握。队里的官兵虽然不一定是蒋的亲属,但绝大多数是浙江籍的“子弟兵”其军官都为从中央军官学校挑选出来,又忠于蒋介石的嫡系学生。平时大队在德安里驻扎一个连,在南岸黄山别墅也驻有一个连,大队部则设在歌乐山官邸。此外,侍卫长又按定例从大队的士兵中选拔一排卫士队,再在其中选出作为便衣卫士的若干人。这样,每当蒋介石外出时,卫士队总是先期到达目的地,在蒋活动的周围布岗设防,以保安全。那么,为什么警卫大队的士兵甘愿忍受队里严格的纪律约束,而又对蒋忠心耿耿呢?一是因为他们的给养好,物质待遇优厚;二是他们只要能在警卫大队熬上一两年,就有机会被保送去军官学校培养,毕业后犹如穿上了“黄马褂”外派到部队不但官升三级且有终身飞黄腾达的希望。

还有一个成立于 1940 年的侍从室第三处。这是由陈果夫一手包办的机关,说是专管人事,但究其实际,历来仅办理一些人事调查、登记和考核方面的事项,而主要对象又局限于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各期结业学员,兼作他们的联络枢纽。至于

国民党高层的人事权，蒋是不会假手于这个处的。这处设在远离重庆市区的南温泉，因不属笔者所在的德安里范围，故对其知之不详 这里就不加细述了。

## 五、蒋介石的秘书群

秘书而成群，这说明担任蒋介石的秘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这些秘书中，有谙于公文程式‘等因奉此’的文牍人员，更多的是学有专长、才华横溢、足智多谋、能献计献策的谋士。这些人在政坛风云中如何登龙的，笔者在以后都要一一详述。现在先谈一个素为外界所不了解的问题，即侍从秘书与侍从室秘书的区别。

### (1)侍从秘书与侍从室秘书

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综揽党、政、军大权，自然要有许多幕僚为他办事，侍从室就是为他办事的最高幕僚机构。设有三处十个组，除了每处有主任，每组有组长外，余下凡有处理政务资格的文职人员统称为秘书（军事人员称参谋或武官）；而在秘书中，又有侍从秘书和侍从室秘书之分。

侍从室秘书一般都隶属于侍从室各个组，特别集中在处理党、政、外交、情报的第四、第六两个组，以及原来的第五组。他们相同于中央机关各科室的秘书，处理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的呈件，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建议、汇报等文、电公事（军事方面则由侍从室第一处各组的参谋处理，此处不谈）。侍从室秘书犹如清代佐理曾国藩、张